

跨越世纪困惑的“父亲”想像

——试论后新时期三种父亲形象的书写

贺玉琼,程丽蓉^①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 后新时期出现了三种“父亲”形象想像:还原了人性色彩的父亲、作为我们精神支撑的父亲及赋予了象征意义的父亲。父亲形象不断被重写,呈现出回归传统的趋势,传达出作家们重建人文信仰,重建社会文化秩序的艺术愿望。

关键词: “父亲”想像;寻父;多元文化

“父亲”的形象长久以来在文化层面上一直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经常被作为文化符码出现在各种文学和社会学、伦理学的著作中,当这一文化符码转化为潜在的想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关于“父亲”的想像就在不同的语境下衍生出不同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尊父、崇父的,中国儒家关于君臣父子伦理思想是其代表。中国传统父亲原型可以追溯到皇帝——皇父,他的统治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皇父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在家庭中的缩影。父亲把持家里家外的一切,成为被尊重的权威。为了维护这种权威建构了一整套秩序,孝道应运而生。何为孝呢?“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要求孩子无条件尊重长辈。《二十四孝》中就有尝秽救父,哭竹的故事。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尊父、忠君、效国的“孝道”已成为一切家庭和社会的基调。父亲无可撼动的权威地位由此产生。从“五四”先驱开始,一种审父意识被带到文学创作和批评之中,进而影响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叙述。众所周知,“五四”启蒙思想以外来话语角逐合法地位,传统的孝话语遭到排斥压抑,这就使父子关系在现代文学中表现出一种全新的主题,“弑父”的主题贯穿始终,父子冲突弥漫在新文学作家的创作中。与之相应的是,“父亲”受到前所未有的贬抑,呈现出专制腐朽、老国愚民的文化人格特征。鲁迅《故乡》中的成年闰土,《药》中的华老栓,张天翼《包氏父子》中的老包,老舍《二马》中的老马,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等等。但到了后新时期,“父亲”形象的书写较之过去再次发生逆转,无论是对民间父亲、乡村父亲的书写,还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父亲的书写,父亲想像都有悄悄回归传统的趋势。

新时期文学以来,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的无父书写中,父系文化秩序受到怀疑,从“顽主”戏谑到新生代的多元消解,父亲的文化道德权威受到挑战。然而,神坛陷落之后,父子关系的血缘亲情开始重新浮出历史地表,还原了人性色彩的“父亲”不再像过去那样要么高踞神坛,要么站在丑陋者或敌人的队伍里。余华的创作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内心需要和外在对世界的冲击下,余华的文化观念发生了变化。在《在细雨中呼喊》中,“我”一个既不受父亲所爱,又不被兄弟亲睦的孩子,用自己的经历去证明无父与有父的不同。“我”的父亲已彻底堕落成丧失人伦的无耻之徒,但幸运的是我被养父所收养,养父是一位知冷知暖、知情知义的父亲。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着重温人间的温情,父性正在悄悄地回归。余华小说中“父亲”的回归是从《活着》(1992年)开始的。“父亲”福贵尝尽了生活的种种苦难,从纨绔子弟沦为贫民,从儿女双全到子然一身,社会更迭,世事变迁,命运一次次地把他推向绝境,不幸与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但这一切都没有把他压垮,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活着。承担着责任、苦难、艰辛、死亡的世俗化父亲形象,让我们更能感受到生命本身的坚韧和魅力。余华在若干年遗忘父亲之后,终于无法忍受无根之轻的沉重。于是通过《活着》,从记忆深处重新唤醒“缺席的父亲”,从而完成了余华早期关于损父到无父再到认同父亲形象的寻父轨迹。从《活着》开始,余华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关心他们的生存哲学、日常伦理和道德观念。这一转变典型地体现在他的《许三观卖血记》中。

^① 收稿日期:2008-04-24

作者简介: 贺玉琼,女,湖南攸县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程丽蓉,女,四川荣县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许三观是千百位父亲中真实的一员,血是生命的象征,“卖血”无异于卖命。许三观完成 11 次卖血行为中,9 次都是以父亲的身份,如许三观为了招待二乐的生产队长而卖血喝酒的场景,其展现出的父子之情令人心酸。许一乐患了肝炎要去上海医治,许三观怀揣着挨家挨户借来的两块三毛钱上路。他沿途喝着冰凉的河水,一次又一次地卖血,更使人感到凄凉。父亲的血挽救了家庭,挽救了义子的生命。凭借无私的父爱,重建了家庭秩序。作家经历了从无父到有父,从无父的混乱到有父的秩序的过渡,铸造起父性的伟大与质朴,坚韧与执著。余华转型后的代表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父亲形象都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意蕴。

这种有关父性回归的创作,一直延续了 20 世纪初。须一瓜发表于 2004 年的短篇小说《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应该说呈现了由背对“父亲”转为面向“父亲”的第一步。我们敞开内心去拥抱并重新打量“父亲”,从感情上接近和认同,设身处地地对“父亲”报以怜悯与温情。不同于卫慧们对“父亲”的拒绝,须一瓜的小说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父亲”。儿媳妇晚娥在洗澡时发现公公在偷窥,深感厌恶,但没敢声张,结果公公的行为被丈夫发现,遭了一顿毒打。面对这样的尴尬窘境,晚娥与公公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出乎一般逻辑,从这里开始,晚娥表现了对公公的宽容、怜悯。如小说开篇的一句“没有那天就好了”,一下子就切入了故事的核心,晚娥是不希望有“那天”的。这种怜悯与温情是源于对“父亲”个体生命欲望和亲情的理解。晚娥首先将自己置身于家庭的温情中来看待公公的偷窥事件,丈夫阿青和公公一直相依为命,两人之间的爱与恨纠缠在一起,使得父子俩的关系变得复杂而有张力。晚娥没有置身事外,这是她可能宽容、同情公公的前提。在此之前的很多小说,比如卫慧的《艾夏》,主人公自成一个自足的世界,“父亲”是无法介入她的生活的,她也不愿介入正常的家庭生活,两者间的绝缘,让卫慧们失去了对“父亲”理解和同情的基础。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情感指向,就是对“长久以来被漠视的父亲的欲望和绝望的发现,怜悯和愧疚”。^[1]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提升了小说,这个主题接续了朱文《我爱美元》式的“父亲”想像,在把“父亲”还原到肉身并正视生理欲望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不仅正视“父亲”的欲望,更正视“父亲”一生的坎坷以及他的希望和绝望。此“父亲”想像无疑突破了单一的生理因素,具有了切入“父亲”精神世界的纵深向度。

二

多元文化语境丰富了文学创作思路,“父亲”形象也随之不拘一格。既有上述的企图还原父亲本真一面,还原父亲人性色彩的父亲形象,同时又有另一种父亲想像。它还原了父亲在家庭伦理意义上的父格,父亲赋予生命和给予精神支撑的光辉呈现出来。作家们试图寻找可以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宁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寄托,寻找可以使自己勇于面对苦难与荒谬现实的精神支撑。

李西岳在《农民父亲》(1999 年)中用乡土语言,带着故乡情结塑造了一个原生态的父亲形象,普通平凡而又有个性色彩,倾注了作者对“父亲”的炽热情感:一生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以德抱怨,“胳膊断了装袖子里”。对“父亲”给予同情的同时又真切关注“父亲”的精神世界。精神的相同,情感的相近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精神寻父”的现象。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铸就了我们的肤色,铸就了我们的民族,铸就了我们的精神。在今天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更应该寻找农民的坚忍、善良、质朴的精神内核,反思我们自身的人格缺失,以求得自身精神境界的净化和升华。

在随后的白连春《拯救父亲》(2000 年)中,父亲“似乎是与苦难斗争的生活的象征”,散发着在城市中日益消失的人格与人性的闪光点。父亲的宽厚、仁慈、淳朴深深地打动了作者“我”。“那一瞬间,我突然理解了生活的涵义。生活打动了。尤其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在最底层挣扎的人的生活,原来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着柔情。天哪,我多么热啊……”(《拯救父亲》)。为了节省众人的两元钱,父亲到城里买化肥,来回步行 40 多公里。面对艰难的生活父亲节俭至极,却是那样容易感到满足:“一件黑线毛衣谷禾高中穿、大学穿,二弟又穿到大学毕业。父亲穿上的那天一个劲儿乐。”生活重压下的父亲坚韧挺拔,活得自尊、自信。他教育儿子:农民有啥不好?农民就低人一等?你爸我一辈子没有占过任何一分一厘的便宜,活着直呢。做人要本本分分。但是城市却不认可父亲的价值,在城市漠视的眼光中,父亲显得颓唐、卑琐,只能无奈地呆在收容所的水泥地上等待“拯救”——五千元一个人,交钱放人。

在这些父亲形象中,集中反映出乡村作家面对世纪末的现实痛苦与精神焦虑,迫于现实的无奈,开始寻找精神上失落的“伊甸园”。他们把目光投放到父亲身上,试图让自强、勤俭、诚信、宽厚、淳朴的父亲来慰藉他们失衡的心灵,来抗衡自私、贪鄙、冷漠、无情的城市人,抵制欲望泛滥的现代心灵,重塑精神家园。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转型期,知识精英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囊中羞涩的精神贵族在商品化的现实面前有了危机感和压抑感,终极价值的追求难以抵制世俗化的欲望。生存的问题、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等世俗关系困扰着象牙塔中的精英们。

在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2001 年)中塑造了一个“过去时段”儒家精神化身的“父亲”形象。这个“父亲”形象被赋予了古君子似的人格特征:讲诚信,重道义,甘于清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等等。父亲在儿子的理念中升华为道德、良心的象征,父亲成为儿子的精神偶像。主人公“我”在权势、利益的逼迫与诱惑下,逐渐放弃曾经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做人原则,同时也悲哀地感到正在远离父亲的精神、父亲的灵魂。一方面,在行动上,他完成了对精神之父的弑杀,放弃了父亲的做人原则;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有向着父辈的人格进行跪拜。“对父辈的仰慕,实际上是对当下失落的传统文化的留恋,反映了知识分子精英当下的文化心态:对社会政治的反思,对拜金主义、物欲纵横的批判,蕴涵着深层的现代化的焦虑。”^[2]

面对“无父”后的恐慌,作家们开始转向父性的召唤,显示了不同时期对父亲角色的认识和判断。最终,父亲成为立足于大地的精神支撑。父亲们就如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之父,那个在地里终日刨食的亚当,那个匍匐在大地上的、孕育万物的大地之父,正向我们慢慢走来。当我们疲惫无望、焦虑无措时,看看父亲们的身影,就会支撑我们继续走下去。

三

1996年,作家东西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我们的父亲》,小说故事比较简单:乡下父亲来城里探望儿女们,由于儿女们的怠慢与忙碌父亲失踪了。小说在最后提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父亲到哪里去了呢?”这一声追问振聋发聩。东西暗含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是否真正看见了父亲?“父亲”的意义在他消失后突然凸现出来了。整天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父亲”恰恰是被我们一直忽略的人。类似的追问同样出现在艾伟的小说《寻父记》和墨白的小说《父亲的黄昏》中。《寻父记》的故事与以往类似题材小说致力于颠覆父权的“弑父”冲动不同,它重新引入“父亲”这一象征,目的在于指向我们自身难以察觉的与“父亲”的血肉关系,从而发掘出生活中令人惊愕的另一面真实。住在儿子家的父亲突然失踪,导致了儿子漫无边际的自责与忏悔,为了得到精神上的救赎,竟从外面找了一个陌生的老头当作父亲来供养。在《父亲的黄昏》中“我”为人子,在无力无奈又努力营救父亲使其免于吃官司的过程中,逐渐发现父辈的衰老,生之艰难,对子辈的爱护,生命残烛的虚弱,表达了强烈的对父辈的怜悯、忏悔和救赎意识。如果说从《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我和爸爸》《我们的父亲》《寻父记》《父亲的黄昏》这个过程的确成为当下对“父亲”想像的一条道路,那么,可以说,这条路一直在延伸,“父亲”在这条路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形象越来越高大。随着作家们对“父亲”的反思视域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深入,是否有这样一种趋势:“父亲”的形象在当下重新得到积极的确认,“父亲”对我们的意义重新得到挖掘和肯定?如果抛除日常生活层面意义,“父亲”的形象是否也重新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正面的象征意味?

在这个问题上,魏微于2000年发表在《大家》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寻父记》提供了考察的范本。小说和《我们的父亲》、艾伟的《寻父记》相似,都是在父亲突然失踪的非常态前提下展开故事,诠释作家的主观思考。“父亲”在“一个初夏的夜晚,他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至今音讯杳无。”在父亲失踪之后,剩下来的母女的生活产生了空前的变化。“我和母亲像做了一场噩梦,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痛苦和羞辱。我们甚至感到了一种毁灭。”之所以会有这样迫切地需要父亲,需要他来支撑我们的生活,重塑我和母亲存在的意义。因为“父亲”有着别人无法取代的意义。因为“父亲”的失踪,巨大的生活空隙让她们无所适从,寻找“父亲”的过去成了她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对母亲而言,失踪的人意味着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而对于女儿来说,“父亲”

的失踪意味着生命源头的可疑。“父亲”首先是一种血脉之亲,“常有人说我长得越来越像父亲了。我喜欢这个比喻。我是他的女儿,他身体的某一瞬间的一部分……十六岁那年,我惊诧地在自己的身体中找到了父亲。”但此时,“父亲”失踪了。所以“我”必须去寻找,找到“父亲”来确认自己。

真正的寻找开始了,“我”却发现,“父亲”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因为寻找,使得一个具体的目标慢慢变得虚幻,逐渐带上了寓言的气质,转变为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我”得找,即使我身体疲惫了,在另一个城市成了家、生了孩子,在内心里依然没有停止过寻找。寻找“父亲”最终置换为寻找自我,为了“我成为他”。小说至此已经开始了一个形而上命题的探究:“父亲”于“我”更重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小说中明确了题旨:“对我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寻找父亲,从16岁那年开始,也许应该追溯到更久远,从我来到世上的第一天起……我就是为了寻找父亲而诞生的……”“父亲”终于从肉身变成了一种精神指向,“寻父”成了我们的宿命和目的,“父亲”既是我们得以来到这世上的物质和血缘前提,在抽象层面上,“父亲”的意义在于能够通过他确立我们存在的意义。无父的儿女们在失去文化记忆的同时也会因此在根本上失去与历史、传统和秩序的内在关联,人因此失去证明自身存在意义的价值参照,使“自我”处于一种“无根”的漂流状态。这时,人们不知不觉地开始寻找父亲。“寻父意味着对父子等级秩序的重新认可。父子等级秩序实际上同时拥有生物基础,社会机构基础和文化身份基础的合理性。这种等级秩序业已成为文明历史的一种重要的象征。寻父同时也表明儿辈的一种‘自恋’心理,那就是企图通过对父子等级秩序的重新认定来保护自我,确立自我。毕竟,父亲还标志着儿子生命的未来时态以及他的成熟形式。这是人类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之所以至今还在‘寻父’的动因。”^[3]

在魏微的《寻父记》里,“父亲”超越了《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我们的父亲》,《寻父记》,《父亲的黄昏》里的探讨,远远走在我们的视线之前,高居我们的世界之上,甚至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父亲”已经成了我们的生命中的“神”,一个确立我们存在的精神符码,要我们必须去寻找和追随。至此,世纪之交的“父亲”想像达到了至高点,成为“父亲”最辉煌的一个形象。

四

在父亲形象不断重写的背后,潜隐着作家不同的文化选择和复杂的情感向度。“新写实主义”和“晚生代/新生代”的写作带来了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回潮,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更加沉潜下来,作家将探究的目光专注到家庭、伦理、情感等这些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也使得他们重新审视血缘上的父子关系。在父亲形象的重构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作家温情和悲悯的一面。而在先锋文学的书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欲望之父的丑态——撕开父子间温情脉脉的面纱,揭露父亲对儿子的迫害,揭穿传统伦理道德、忠孝节义的虚伪性。而且,多元文化语境下作家的人文情怀的自由展现使得他们

对“父亲”个体生命存在有了一定的尊重和认可。作家们在让父亲们在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却没有让父亲回到“超我”的时代,而是允许父亲保留一些“本我”的成分,处于“自我”的正常轨道上来,还原父亲的人性,恢复父亲的个体的生命欲望。关注了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父亲”,贴着人写,以人为本,对人物都体现出相当的尊重和理解,这在“人物工具论”的文学时代是无法实现的。可以说,将人文情怀逐渐落实到生活和情感伦理的细部,这是我们文学的进步与提升。作家们将人文情怀贯通到文学的每一根神经末梢,还增强了文学与生活的对话能力。更重要的是世纪末的知识分子面对信仰的危机,人文荒漠的焦虑,试图建构新的人文理想——寻父,寻找精神支柱,寻找文化理想。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寻根文学中“退化”的父亲形象;先锋小说中父法世界的解体;新生代作家对父亲的多元化消解;“新新人类”对父亲的放逐,充斥其中的是父亲光环的消失,父亲神圣地位的坍塌,父亲的生命力的萎缩,直至父亲的缺失,父法秩序的存在意义受到怀疑,导致了信仰的危机。于是,中国学人关于自身的国家、民族、个体文化身份,关于回归传统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情结油然而生,20世纪80年代的“西学热”被90年代的“国学热”所排斥并取代。在经历了弑父的洗礼后,失去了父辈的子辈渐渐感到惶恐和不安,在打碎“父亲”神像后,他们开始走上了新一轮的寻找“父亲”的征程。这寄托了作家们重建

人文信仰,重建社会文化秩序的艺术愿望。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这样就开始了后新时期对父亲形象的重构。文学创作进入了父亲形象的还原期,呈现出回归传统的趋势。对父亲人文色彩、人性的呼唤成为一种期盼。然而,“‘父性文化’的重建是一个拾掇起被时代击碎的文化残片进行重新整合、模塑并加以价值确认的过程,它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寻找、皈依、认同以及再造主导型权威文化的努力。而有效的权威文化应该是开放体系和文化综合的产物,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都不足以支撑起民族的精神大厦。”^[4]所以,重建新的社会文化秩序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邵燕君.看《上海文学》[J].中文自学指导,2004(4).
- [2] 陈千里.凝视背影——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与文化想像[J].天津社会科学,2003(3).
- [3] 杨经建.以“父亲”的名义:论西方文学中的审父母题[J].外国文学研究,2006(1).
- [4] 胡玉伟.重建父性文化及精神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后军旅小说的文化解读[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5(1).

(责任编辑:黄声波)

(上接第84页)

两性合作与对话的因子,强调了男女之间的交融互补,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男女关系模式。

以上所阐述的是道学关于性别问题的主流观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道家、道教的性别思想中难免会有糟粕混杂。例如,道家经典《列子》借荣启期之口道出身为男性的自豪,他说自己今世有三乐:此生为人一乐,为男二乐,长寿三乐。说到为男之乐,道是“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列子·天瑞》)这种男性优越感反映了道家并未彻底摆脱男尊女卑的成见。道教经典《太平经》中也有些男尊女卑的思想,这在它的“阳尊阴卑诀”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即:“夫天命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故男所以受命者,盈满而有余,其下左右尚各有一实。上者盈满而有余,向常施于下阴,有余积聚而常有实……故阳得称尊而贵也……阴为女,所以卑而贱者,其所受命处,户空而虚,无盈余,又无实,故见卑且贱也……今女之妊子,阴本空虚,但阳往施化,实于阴中,而阴卑贱畏阳,顺而养之,不敢去也。”^{[3]386-387}《太平经》还认为“阳者好生,阴者好杀。阳者为道,阴者为刑。阳者为善,阳神助之;阴者为恶,阴神助之”;^{[3]12}“从阳者多得善,从阴者多得恶”。^{[3]94}这些说法显然与《太平经》男女平等的思想主张自相矛盾,从而为后来道教走向儒家的男尊女卑提供了契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道学的性别观包含了诸多积极、进步的因素,这些思想

对于现代社会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也是大有启迪的。

参考文献:

- [1] 黄钊.道家思想史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
- [2]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M].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
- [3] 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4] 陈全林.周易参同契注译·悟真篇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5]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6] 官哲兵.当代道家与道教[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 [7]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26.
- [8] 陶秉福.女丹集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9] 李素平.女神·女丹·女道[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217.
- [10] 张允熠.阴阳聚裂论[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53.

(责任编辑:王友良)

Abstract YAN Zhen is both a writer and a researcher of LU Xun. His novel *Green Water* has in it some of LU Xun's element, which is seen through the tragedy course of CH I Da-wei, a contemporary scholar. In the psychological growth of CH I Da-wei, traces of the Madman, XIA Yu, LU Wei-fu and WEI Lian-shu in LU Xun's novels can be found.

Key words YAN Zhen; *Green Water*; CH I Da-wei; LU Xun's element; scholar

(14) Getting Rid of the Centennial Confusion: Three "Father" Images in the Post-new Period

HE Yu-qiong CHENG Li-rong(096)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ost-new period, a dissimilar "father" image emerged. This image of father is both humanized and symbolized and psychologically reliable, which represents the tendency of returning to tradition. In the "father" image constantly being rewritten, the writers' artistic desir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e belief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order is embodied.

Key words "father" imagination; father seeking; multicultural

(责任编辑:文爱军,李晓鸿)

《湘东文化》征稿启事

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刊《湘东文化》在各级领导和各界同仁的鼎力支持下,即将面世了!由株洲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各编委单位协办的《湘东文化》将以继承、弘扬湘东文化,促进湘东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办刊宗旨。《湘东文化》初期为季刊,栏目拟设:湘东溯源沿革、神农文化、历史人物、湘东百业、旅游名胜、文物典籍、民俗风情、方言俚语、当代名人、工商精英、域外游子、红色记忆、校园风采、文化动态、知名品牌、诗词歌赋等。刊物坚持通俗性和学术性的统一,热切期待你的加盟和赐稿。

附:

编辑部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151号(湖南工大师院校区图书馆五楼)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易小斌:07332661105;陈立人:07336593887

电子邮箱:xiangdongwenhua@163.com; yxb9957@126.com

《湘东文化》编辑部

2008年7月